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七期 ——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5d)

- 【人物专访】 “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曹轶欧 师东兵
【研究综述】 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 董国强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专访】

“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曹轶欧

• 师东兵 •

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和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一下子从受人尊重的顶峰跌落到横眉冷对的沟底。还是彭真出面作了工作，把以王光美等人带头贴大字报要把她赶出高干楼的风波平息下来。从此，曹轶欧基本上不露面了。

得到曹轶欧在木樨地 22 楼的门牌号数后，我来到她的家里。照顾她生活的是侄孙，还在人民大学读书，他告诉我：“曹轶欧现在得了脉管炎，不是熟人她是不会客的。你大概知道吧，为了住在这里，还引起了一场大的风波。我们家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张桌子还是人家不要才带来的。所有康生的东西全部没收，曹轶欧除了她自己再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家里的人被迫和她划清界限，我到这里来照顾她是经过了组织批准的。你要采访他，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不然，我也要向中央汇报的。”于是，我只得出示了我的介绍信。他仔细地看了看，答应和曹轶欧商量商量。以后，我便连续三次见到了曹轶欧，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她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思维和反应都非常敏捷的女人，她有六十多年的党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和了解，脑海里贮藏着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每个老一代领导人的“档案”，从她的言谈里，我好象看到了康生的影子。由于受所谓路线斗争的模式的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

种政治斗争的固有框框，她总是一开口就给一些历史人物和领导人划线，戴帽。于是那些在历史上有什么“不光彩”痕迹的人，就成了她所嘲弄和反对的依据。这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天，曹轶欧出来了，她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道：“我是从来不接受记者或作家一类的，你想写康生，在这种气候下你要么骂他，要么写他的罪行，他对革命的功劳你敢写吗？敢实事求是地写吗？”

我说：“我这个作家只是想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不涉及评价任何人的功过是非，那不是我甚至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还是留给后人或历史学家们做吧。我只是想通过你，把康生的为人、工作或活动准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以共同研究历史的平等地位来交谈，如果你不愿意谈也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将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机会，康生有灵也会为你而感到遗憾的。我记得你在1967年8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铁面包公，任何说假话和任何捣鬼的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你的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曹轶欧想了想，笑了：“是的，我是说过那样的话。看来你是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了。”她等我作出答复后，话锋一转，“那么，你想谈什么呢？”不等我回答，她又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1964年和一个叫艾恒武的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杨献珍是什么人？她在历史上和薄一波等人写了‘反共启示’，明确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历史上几次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唱反调。所以，合二而一这样的文章和观点直接干扰了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情况反映到康生这里，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一些同志组织了批判和讨论的文章。这就使那个林青山对康生怀恨在心，康生逝世后受到批判，林青山一连写了好多文章和什么作品，捏造事实，对我和康生进行丑化。他写的那本《康生外传》胡编乱造，甚至连我和康生的对话他也伪造，伪造得没谱了，既不符合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任何的根据。好象党校的整人都是我们操纵和策划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把纪实文学变成专门造谣和丑化人的工具，那还有什么文学的价值呢？我希望你不要象他那样写东西。他根本没有高层政治生活的常识，根本不懂得我们党的高层是怎样决策的，根本没有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就在那里信口开河。”

我说：“你作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大可不必为此生气。外界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你可以通过事实来说话嘛。后人绝对不会根据一本野史书来决定对一个人的评价的。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你们，这说明了你们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历史，属于整个人类的文化或历史遗产。所以，别人爱说什么都无关大局。如果你想对历史负责，可以和我多谈谈，我会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分析研究，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创作一本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

曹轶欧的情绪逐渐地冷静下来了。他和我的谈话就从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教师和学生写的一张批判陆平等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彭真的大字报谈起。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曹轶欧亲自策划炮制的，林青山的作品甚至把一些细节都描写的活龙活现，曹轶欧说：“你想可能吗？康生和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不假，但是我

们从来都是严格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达以后，聂元梓等人根据通知的精神，对北京大学陆平和北京市委彭佩云等人传达的彭真为首的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贴出一张大字报，也就是被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刚贴出来，受到了北大学生和教师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我亲自去看了大字报，我们认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表示要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人把大字报抄了回来，由康生把它作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现在，有些人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矛头指向康生。这叫公平吗？我们宣传中央的通知精神没有错。现在，林青山一类编造了许多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情节。我真不知道他是从哪个阴沟里翻腾出来的东西？”

我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既然你是支持那张大字报的，就已经表明了你的政治态度。一些细节的真假，我们都是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情，即：1974年底，康生曾经委托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揭发，说江青是叛徒。同时，别人的文章里也说康生曾经向周恩来谈起江青是叛徒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轶欧镇静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听康生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后，中央派人向我了解这事，我是这样回答的：大约1974年和1975年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确被捕过，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说她是左翼人士。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她放了，她并没有写过自首书。为此，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我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对康生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当即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一些文章里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说：“我不想对这些事情表态，我只想了解具体的事实。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这个原则。你刚才所讲的这些正是我要掌握和了解的。”

曹轶欧闭着眼睛想了想，说：“我和康生是1927年结婚的，一些无聊的小报把我们的结婚说得乱七八糟，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内容。我在这里可以郑重其事地告诉你，由于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结合的时候都在蒋介石实行大镇压的时候，所以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密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我们受中央的决定而结合，成为合法的夫妻。我们都对父母包办的婚姻采取了抵制，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猜测和无知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样的文风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逝世以后，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他的定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军、光荣的反修战士’。我认为这个定性是比较准确的。现在有人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请问：康生一辈子革命，他搞了那些阴谋和见不得人的事情？是的，从他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党内一直担负着秘密的情报工作。本来我是不想公开这些的，但是现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实在太多了，我不得不讲一些实话。”

这个曹轶欧，几乎每讲一件事情，都要批驳一下别人对她的指责。我为了听她讲下去，只

好耐着性子认真地听她介绍她所愿意讲的过程，只是不断地提醒她：“不要激动，只要讲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和雄辩力的武器。你不要讲过多的东西。”

她逐步地恢复了常态，缓慢地对我讲起了康生的经历：“康生到中央工作后，多年来担任特科的反内奸和反敌特活动的领导、组织工作。他亲手处决了许多打进来的敌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党中央决定处决的叛徒顾顺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来率领特科的人员亲手打死的。当时康生用斧头亲自劈死了他的XX。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亲自审讯，派人调查，挖出了许多的内奸和混进我们党内的特务和变节分子。当然，由于斗争的复杂，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好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领导的审干和清理阶级队伍，也是有很大的成就的。这些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现在，有些人要一笔抹杀康生同志，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就连彭真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说：‘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康生无论在什么问题都是守纪律和有党性的。至于康生的私生活，那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模范。他是从来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下流活动的。那还在上海搞地下党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就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任何党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嫖娼和乱搞女人。因为那时许多党的干部就是因为生活放荡而暴露了自己，被敌人逮捕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生自己制定了这一纪律并且严格地遵守。一直到建国后，他都从不乱来。毛泽东曾经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惠，美女坐怀而不乱’。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正派无私。这样的共产党人，却被我们的一些人攻击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叫人不可理解。”

我对此只能以不置可否来作对付。

曹轶欧继续说：“现在有人说康生盗窃文物和古董。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错，康生是喜欢鉴赏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销没有任何的嗜好，就是爱买图书，特别是古版书和一些古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的时候，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同时他亲自到销毁市场去，花钱买或者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时他就说：‘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就这样，他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不但无罪，还且有功。现在不分是非，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是不对的。康生对书法和古画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书法本身就是珍贵的字画。但是他从来不以此谋求特殊的荣誉。康生在建国以后，还是保持着他在秘密工作时的传统。他的淡泊名利和艰苦朴素，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好评。这一点，江青说老实话，也是人们的榜样。江青的爱好是照相，但是她买胶卷和相机都是自己掏钱，没钱的时候才向毛泽东同志伸手要。她从来不让别人给她送礼。就是朋友给他送来的东西，她都要拒绝。这一点，是现在的那些共产党员干部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审判江青和林彪的时候，起诉书里也有康生的名字，就更叫人无法接收了。你大概知道吧？康生是和林彪死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讨论四届人大的新宪法的时候，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当黄永胜和吴法宪等人再三提出他们的主张的时候，康生质问黄永胜：‘你们军队的同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改变我国国家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借鉴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宪法经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听？’当听到林彪的意见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林彪同志应该参加党的政治局会议，他不参加会议如果是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那就要考虑再增加一个或几个副主席来进行党的正常工作，不然这样下去不利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康生同志的这些意见和斗争，正是对林彪一类人的当头棒喝。同样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康生和其他同志同林彪的斗争，那文明国家现在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

我怕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就打断她的话问道：“你的评价就不要继续讲了，你谈谈康

生对江青的评价如何？他认为江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曹轶欧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它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当时江青对我插手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很不满意，当着康生的面对我大发脾气：‘中央文革的大事你为什么能不通过我呢？办事组不能另外搞一套，今后要和我商量！’康生看到江青的霸道，也只得迁就她，对我说：‘今后你不要再插手小组的事情了，让江青自己去处理问题吧。整个运动中，江青是说了算的人物。’我对江青的许多不满，都被康生给压住了。为什么？因为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我们顾全大局嘛。我们和江青的许多活动是有区别的。江青有她自己的创造，而康生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江青和康生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康生和江青谈过：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江青武断地说：‘这是毛主席讲的。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当时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的讲话里公布了毛泽东的一首诗，就是批评郭沫若，内容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我马上问：“江青传达的这首打油诗是真的吗？1976年粉碎江青、张春桥后，人们对这首诗的真伪产生了怀疑。最近听说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连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些人都说这首诗是假的。他们说，他们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诗作。”

曹轶欧鼻子哼了一声：“毛泽东能把党内的重大事情和他身边的人员都说吗？笑话！我们党内有一个规矩，凡是保密的东西都说是假的，或者说不知道。江青讲的完全是实话。毛泽东的那首诗作，江青曾经给康生也看过，也给郭沫若传达过。康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 and 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收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这话，康生给我讲述的时候，我们也是进行了一番讨论的。什么汪东兴、张耀祠一类人，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只负责警卫工作，并不让他们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曾经和康生讲过：‘党内的重大事情，我们决定了再告诉他们。某些人喜欢从我的身边人员里打听我的动向。我是从来不和我的身边人员讲说大事的。这一条，应该成为我们这些最高级干部的纪律。陈伯达在这方面做得最不好。我的许多讲话他自己传给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人，甚至传给了王力这些人，我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他。他哭过好几次了。’这些话，不但康生知道，总理和邓颖超这些人人都知道。为此事，周恩来还专门给郭老作过解释。”

“你能否具体地讲些事实和情况？”我这样说，“我们还是不要抽象地谈问题，而要讲事实……”我一口气给她讲了许多历史事件，希望听听她的介绍。”

曹轶欧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你想知道从1962年下半年，我们党领导的几次大论战吗？反修的主要任务和大论战的具体提纲，就都是经过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过目。有些文章片段，却是康生亲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说是他亲自写的，胡说八道，他们搞的东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亲自领导的写作小组写好后经毛泽东同志过目定稿的。命题是康生等人和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康生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加上了光荣的反修战士这样的称号。你好好想想，这是容易的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对康生的攻击和陷害，早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敌人就有意识地制造反间计，企图利用我们党内同志的手把康生同志打下去。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

‘有人对康生同志不满，那是他们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活档案。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对我们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前的审干，我们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主要靠康生同志这样的人来提供资料和证据。于是，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们不要上这些的当。还有周恩来同志等几个老同志，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党把康生当作敌人来对待，我敢说，这是干了公开的敌人所想干又不敢干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曹轶欧竟然是这样大胆地和我谈话，我对她的这些言论只能报之沉默。

“不过，我对我现在的遭遇和所受的攻击毫不在乎。康生生前这样对我说：‘现在我们党有毛主席，一切事情都好办。将来毛主席离开了我们的时候，如果赫鲁晓夫们上台，资本主义复辟，那我们的脑袋就可能落地。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这样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康生就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有些人不相信这些话，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看的那样地严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们要置于死地。”

这些话，我从另外一些当时参与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那里得到了印证，她所说的话都是确实的。康生还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这时，他的话无非是针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说的。只是他死得早，但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却看到了他所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罢了。

曹轶欧和我谈话的时候，几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吃药。她不住地说：“我实在是不愿意拖累我的孩子们了，我让他们和我划清界限。跟着毛泽东造反的时候，我说过：‘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现在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但是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跟上我作无谓的牺牲。我吃药，无非是给孩子们一个信心，证明共产党员是意志是钢铁的。”说到这里，她竟然掉泪了。唉，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欠下的债，总是要到一定的时候偿还，不管这种债务是什么类型的，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看来，他们当初下决心整那些“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是有所思想考虑的，只不过不希望他们的准备变为现实而已。

我问道：“你能给我讲讲1966年初，更可以追溯到1965年时毛泽东委派江青准备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情吗？康生在这场风云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个结论是康生影响了毛泽东的，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吗？现在已经是历史了，我想如果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对我们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意义和帮助。以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轶欧一边喝水一边跟我谈道，“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还在1963年下半年的时候，江青到我家谈京剧改革的问题，曾经问过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过了几天，她又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康生说：‘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象王莽。’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我问：“江青没有说她是听谁说的吗？”

曹轶欧说：“江青从来不轻易地讲什么人的名字，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她不讲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询问的。康生马上回答：‘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江青不动神色地点点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娥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娥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神州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当然要表态了：‘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间那次谈话并没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康生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活动的呢？”我问。

曹轶欧说：“大约是1964年初，江青问康生：‘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连提了几个，江青都摇摇头。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了，还有其他几个，都没有被江青看上。她当时的要求是：首先从文艺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问题上来。她说得很清楚：‘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象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和有气魄。’康生说：‘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找到了姚文元这个笔杆子。姚文元这个人，过去康生对他并不熟悉。但是我们看过他的文章，当时他和周谷城进行过围绕时代精神问题的大论战。对周谷城把时代精神说成是各种精神的汇合才能是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和驳斥。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好，很有论战性，也有一定的水平。缺点是他的知识太杂而不精。所以，康生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康生曾经跟我说：‘姚文元除了能写写文章，其他的政治经验并没有多少。这样的人抬得太高对他对党并没有多少好处。’后来的事实果然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艺界找一些秀才、演员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这不行呀！他们怎么能有治理国家和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呢？包括陈伯达本人，康生对他也是有看法的。康生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江青提起过：‘陈伯达、王力这些人不能重用呀。如果把他们放在国家和政党的重要职务上，一但有事情，是顶不住的。’毛泽东是很自信的人，他认为有他自己掌舵，天不会塌下来。他丝毫也不会想想自己总是要见马克思的。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尽管对江青一再培养和锻炼，但是在用人问题上恰恰没有把他自己的精髓传授给

江青。那就是必须在军队里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随时应变的措施。”

我发现曹轶欧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她已被历史的结局所吸引，说的话才是她真正的心里话。我说：“我们还是围绕着康生同志来谈吧。康生对《海瑞罢官》的意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文章发表之前看过吗？”

我没想到这一次曹轶欧笑了，笑得那样开心：“康生当然看了，不看就显示不出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了。那是文章基本定稿后，江青让康生帮助修改和提意见。这篇文章当时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周总理也没有告诉。按照江青的解释，这是一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先发表出来看看风向。要引蛇出洞，要掀起风波，要逐步深入，要在这场斗争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和自己的理论队伍。当然，也要通过这场斗争来考验和检验我们党的干部的觉悟和力量。这个意见虽然是江青给我们说的，但是康生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事实也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林青山一类的复仇文人根本不了解事实的真实情况，凭想象来写作高层次的政治斗争，用的那些语言都很下流，好象黑社会的东西一样，没有半点可信度和水平。你送给我的那几本书我看了看，好象林青山的文章里还抄袭了你的那本《山雨欲来》里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谈话里涉及到的东西。你写的康生的谈话好象是从他在文革中的几次谈话里面概括的吧？你写的东西都有一定的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在过去都和一些人们谈过，是事实。我这个人，是事实就是事实，不是事实就不是事实。是事实的东西，就是证明我错了我也敢于承认。我这个共产党员，我觉得自己当得无愧。我们搞革命的时候，他们……”

她有点象江青那样陶醉了，我赶快把话题转移过来：“这么说来，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发表之前，康生是看过了？”我见她点头后，又问道：“他没有告诉彭真那些人吗？”

曹轶欧说：“那怎么会告诉他呢？但是彭真在1965年11月20来号，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专门问过康生：‘你知道上海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吗？’康生回答：‘一无所知。我也是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彭真又问道：‘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康生说：‘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彭真那个人很多心，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因为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这才引起彭真的极大不满。他对康生说：‘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康生回答：‘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彭真听康生这话没有向着他的意思，就不再和康生讲这件事情了。直到他们炮制出那篇被毛泽东斥之为‘反革命纲领’的二月汇报提纲，才把这场斗争升级了。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搞法，有人说是这个策划，那个密谋的。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来看，那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斗争逐步推进成那个样子的。就是连毛泽东也不知道斗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式。当然，他对斗争的必胜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问题的。这里，就要提到重用林彪的问题了。其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并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倒是康生和陈伯达、江青这些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江青，把斗争一再升级，把中央文革小组一下子提高到政治局常委之下，取代了书记处。这是连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但是那也是当时斗争的需要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江青蓄谋的。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军队的稳定和防止军队被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利用。他每天都要和一些同志谈话，是秘密谈话，就是到今天，有些谈话的内容也没有公开。你可以找一些当事人好好谈谈，他们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情况的。不过，这次中央全面地否定文革，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档案全部毁掉，他们是利用给一些人平反之机毁掉材料和档案的。这太可惜了。我为什么要给你谈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不谈，今后就没有人会如此全面地了解这起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过程和来龙去脉了。仅仅凭文献和文件及会议上的讲话是远远地不够的。”

我问道：“康生没有给你们留下重要的材料和他的笔记、日记一类的东西吗？”

曹轶欧说：“康生留下的东西我曾经整理过，现在都被中央派来的人拿走了。全部的文件和文字，几乎都拿走了。连我们自己买的东西都拿走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康生已经死了几年了，我又不是不服从中央的决定。现在拿我开刀有什么用处？无非是让一些人高兴一下，起个报复的作用罢了。没有意思，一点点意思也没有。”

提到这些令她伤心之处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似乎有泪水，但是她忍耐着，没有在我面前流下来。是的，我看得出来，她竭力要在我面前塑造一个坚强女性的样子。

“彭真他们搞得《二月汇报提纲》，康生究竟看过没有？”我再次想证实这个问题，因为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说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通知搞的”，时过二十多年了，我想尽可能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一再说：“这个问题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你说实话就可以了，我又不是搞康生和你的专案。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不同意的话，我不会把你的谈话公布出去的。这对康生现在也没有什么妨碍嘛。”

曹轶欧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彭真并没有把二月提纲的文件给康生看，也没有告诉康生是准备把那个文件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当时，彭真在文件起草前连续开会，康生是参加了会议。但是康生在会议上的一些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采纳。比如说，康生提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等等。文件一点也没有涉及。会议的记录要康生看时，康生说：‘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直到1966年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康生才看到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什么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先立后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等。老实说，这些话本身并没有多大的错误。问题是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提出者的用心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包庇吴晗和那些当时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刚刚要涉及到要害是罢官的时候，你彭真提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究竟是指谁呢？很明显，是指毛主席嘛。当时有人问彭真，你那个学阀是指谁？他就说：‘谁象就是谁！’你越是不说是谁，你就越是有鬼嘛！这怎么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呢？彭真说毛泽东批准了他的二月提纲，这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明明反对彭真包庇吴晗的立场，怎么会支持他把二月提纲那样的东西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呢？当然，考虑到当时他们在中央的势力比较强大，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都采取了稳妥的策略，包括利用林彪来打击党内的一些反对势力。这一点，当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林彪那时装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死掉的样子，毛泽东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缺乏了解。所以，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察觉林彪有可能把大权交给他的儿子林立果的时候，毛泽东的原则性和他的果断措施就表现得很清楚了。连陈伯达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这个稳妥上的原则性，而本来陈伯达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原则立场的。”

我感到曹轶欧这个人的不同寻常了，怪不得她会担任康生办公室的主任呢，看来她在共产党内没有白白地停留近六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资历远远地要超过江青和叶群这些人，她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女共产党人。要不是由于康生夫人的缘故，她可能会作为老革命家载入中共的历史上去的。我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态度，他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

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理解。’毛泽东接收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在后来的文章中就改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决定这场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后的矛头是一定要到了刘少奇那里的。早在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了发动这场运动，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划。他起初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来攻破和削弱刘少奇的势力，后来又准备发表在同王明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斗争时期发表的九篇文章来引起全党的重视和对刘少奇的认识。最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个突破口选择得好，打准了刘少奇的要害。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样轰轰烈烈地搞下去……”

我问道：“你现在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运动？你认为这场大革命是好的吗？”

曹轶欧没有正面回答我，她说：“我赞成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你不是主张只讲事实而不谈评价吗？”这个女人的嘴很利害，竟想到用我的话来堵我的嘴。我说：“那好，你就接着你的话说下去吧。”

曹轶欧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呢，他们是想把运动搞成1957年反右那样，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游鱼，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搞下去，势必再来个人民群众中的自相残杀。所以，要是说错误的话，他们那套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也未必正确。这当然是后话，也不再提了。提这些目前用处都不大。只是对你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还有用。我讲这些，就是主张实事求是。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这一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正是毛泽东要整党内的走资派，所以，这才挽救了许多群众的命运。”

我说：“这也未必。群众里也有许多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领袖们就都是好的吗？许多的投机分子打着‘造反’的旗号都混进领导班子了去了。真正正派的人，真正安分守己的好人倒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我觉得，现在还是进行法制，实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民主制度为好。”

当我第三次访问她的时候，她给我准备好了几份材料，全是康生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日志。她很激动地说：“你看看，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康生当着常委们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来的指示。’那次汇报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和其他常委们对运动都没有提出任何符合他的意思的意见，自己也没有讲什么时间和任务，重点只讲发动群众。毛泽东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康生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所以，经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的批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提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些情况表明，就是没有康生和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没有林彪，文化大革命也要搞起来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都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积极支持和率先领导的方针，只不

过他们打击的矛头和毛泽东的不一样，针对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罢了……”

曹轶欧的这种大胆的谈话，是她对中央处理康生问题的不满情绪的总发泄。她口口声声地要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我就感到可笑。什么是康生的本来面貌？不就是多年来一直追随毛泽东而坚持整肃一切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已。对此，曹轶欧再没有任何的解释。人们都说康生是整人的专家，是中共历史上历次清除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的主要策划人和领导人，这就决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是引人注目和感到恐怖的角色。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的作用是贯穿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文化大革命遭到全面否定的今天，否定康生和审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表现，是丝毫不奇怪的。实际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暴发户和新生权贵，都不同程度地从他们权力和地位的高峰跌落下来，回到他们应该回的地方去了。用曹轶欧的话来说：“就连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也没有因为他们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而得到他权力的巩固，最后还是被邓小平把他们搞下台了。这说明整个中国的路线变了，变得不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了，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那一条路线……”

曹轶欧的这些话，是她晚年心态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作家，我虽然不想对事件本身发表什么评论，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观点的。我对曹轶欧最后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下台，是符合人民心愿的历史的必然。如果不让他们下台，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还要大。在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纠正两个‘凡是’错误的功劳永远彪炳春秋。一切为纠正那两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人物错误的英雄们、领导们的功劳都将被历史所永久地记了下来，如胡耀邦、陈云等人。为什么？因为那两个代表人物不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却胆大妄为地享受着毛泽东晚年的待遇，这就势必会发展到这些人会空前无知而低能地指挥人民而国家，再一次把人民和国家推进新的灾难之中。短短的二、三年，这两个人的问题和错误就已经暴露无疑，如果统治时间越长，他们的危害也就越大了。”

我后来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短暂的春秋》，就讲述了邓小平等人同华国锋的较量过程，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顺应潮流和一群昏头昏脑的权贵进行斗智的过程。一切看了这本书的读者，都会得出自己公证的结论的……

~~~~~

## 【研究综述】

### 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

• 董国强 •

—

大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和着述始于80年代。到90年为止，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着，其中包括：朱世雄〈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悲剧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亚平〈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8年第5期）、陆建华〈红卫兵：一个社会结构分析〉（《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2期）、云石〈红卫兵运动述评〉（《中国青年》1989年1至4期）、常家树〈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当代青年思潮》1989年第1期）、刘青峰〈民族主义和超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何为〈红卫兵运动的源流〉（《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罗世荣〈对“红祸”的追思〉（《青年潮》1989年第4期）、刘永〈五四运动、红卫兵运动之比较〉（《青年潮》1989年第6期）、宫力〈红卫兵运动兴起的

原因)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凌巍《文化大革命与第三代人》(《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等。这些带有拓荒性质的论著,分别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阶段、性质特点、社会影响、历史教训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认为导致红卫兵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精神残缺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毛泽东的个人超凡魅力、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心理、小农经济基础残余以及建筑在此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社会意识残余(如“忠君观念”和“个人崇拜”心理等)的消极影响,等等。

第二、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66年5—7月是红卫兵组织的产生阶段;1966年8—12月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阶段;1966年12月—1968年8月卷入全国性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8年9月—1970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阶段。

第三、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前期在毛泽东的错误领导和直接号召下发生的、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操纵的一场青少年的政治风暴。它不仅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灾难,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一代青少年自身的成长。有些论著还对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做出了以下比较具体的分析与归纳:1、组织路线上的“血统论”;2、行为上的破坏性;3、思想上的盲目性;4、组织上的分散性;5、心理上的崇拜性;6、价值判断上的否定性;7、目标上的幻想性;8、行为上的野蛮性等。

第四、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是如何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他们的遵纪守法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文革”时期“大民主”的错误做法。〔1〕

笔者认为,上述这些认知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部分地反映出红卫兵运动的历史风貌,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相关论著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绝大多数著述都侧重于抽象的理论论述和定性分析,而疏于相关史料的发掘运用,因而观点和结论显得比较笼统空泛。其次,有些论著虽然有一些简单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要么完全基于论述者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感受,对历史现象的把握缺乏客观的整体性关照,要么完全基于对当时报刊资料和领导人讲话的字面解读,忽略了这些文献产生的具体语境和现实指涉,因而对“红卫兵”概念缺乏必要的分析,对不同时期红卫兵群体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和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发展变化轨迹认识不足,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和派性斗争问题时带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上述基本格局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论著者的学术训练和理论素养、以及资料方面的种种限制等因素有关。资料方面的限制因素毋庸赘言。所谓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指当时的许多著述者亲身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社会动乱,对“文革”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倍加珍惜,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了彻底否定“文革”的主观诉求。这不免使他们的相关论著带有某种主观先行和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所谓论述者的学术训练和理论素养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指在经历了数十年与外部世界的学术交流阻断之后,整个大陆学术界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一般规范已经相当生疏。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学者,尽管主观上不乏锐意进取的积极诉求,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话语体系和论证方法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本土的和时代的局限。许多著述者对“学术研究”概念的真实内涵不甚明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是要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提炼出一些具有思想针对性和学术成长性的研究主题,从而在现有基础上对相关研究加以拓展和延伸,加深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他们较少关注国内外学界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忽略了学

术发展与学术传承的内在关系，而是热衷于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平地起高楼，从而使他们的相关论述带有一种重复劳动的性质，观点与结论的简单雷同比皆是。另一方面，有些论述者虽然对上述问题有所意识，积极尝试借鉴一些国外流行的观点、理论与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控制论、系统论、现代性、民族主义等视角来阐释红卫兵运动，希望形成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但是这种创新尝

试常常因为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而流于空泛，虽然对于拓展研究视野、增加思考维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是其具体观点和结论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徐友渔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于文学艺术、人生顿悟，而不是科学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义、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泛滥。……中国人应该学习和养成绩密地思维、准确地表达的习惯，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是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习惯。”〔2〕他的这个看法与笔者对90年代以前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整体评价庶几相近。

综上所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90年以前的相关论著除了对红卫兵运动的阶段划分和整体定性可资借鉴以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史料积累方面的贡献也不够突出。

## 二

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包括：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赵杰〈论红卫兵文化〉（《青年研究》1991年第7期）、方奕〈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综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来国内红卫兵运动研究综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卜伟华〈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第1期）、史会来、刘晓〈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龙江党史》1994年第3期）、史晓平、史晓久〈论红卫兵〉（《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江沛〈红卫兵心态探微〉（《青年思想家》1995年第4期）、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比较重要的专著和文集包括：于辉《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丁晓禾《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徐友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徐友渔《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等。此外，不少大陆学者还在境外发表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如徐友渔、印红标、唐少杰等人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唐少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等。这些论著也应该纳入我们考察的视野。

与前一个阶段相比，90年代以后的相关研究著述表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密切关注国内外学界的发展动向，积极引进和吸纳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观念、新视角和新方法，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学术与政治的应然关系；第二是自觉摆脱了以往那种带有空头理论和空洞说教色彩的思维习惯和著述方式，注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运用，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口述史料的采集和应用；第三是注重对相关概念内涵的细致分析和概念运用的规范性说明，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的红卫兵群体的深入考察，揭示了红卫兵成员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和红卫兵运动的曲折发展历程，深化了人们对“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概念的认知；第四是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

问题时，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精神，不但注意到文化传统和封建社会意识残余的消极影响，而且还试图揭示这些消极因素是如何通过现实的、不完善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而发生影响的；第五是在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与西方学界展开了有效的对话，对一些十分流行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澄清和匡正。

上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社会史研究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的结果。而这种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研究特色之形成，又与中外学术交往的不断扩大、相关领域学术规范的逐步形成和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异军突起有关。

社会史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学术流派，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到 50—60 年代，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一种时尚潮流，其理论与方法得到十分广泛的运用。最早将社会史视角引入“文革”研究的西方学者是美国学者陈佩华、李鸿永、骆思典和安德佳等人。90 年前后，他们的著述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对于国内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乃至整个“文革”史研究的走向变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考察历史问题时，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大众，不是通过高层人际关系纠葛，而是通过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来解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成因，其核心内容被概括归纳为“社会冲突理论”。

这种新兴学术思潮对年轻一代中国学者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传统认知的颠覆作用，可以从印红标、唐少杰、徐友渔等人的相关论述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印红标在 1989 年发表文章，呼吁加强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开辟“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的这个想法显然受到陈佩华等人研究的启迪。〔3〕唐少杰在评论金春明 1996 年出版的新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时，对该书内容的结构性缺陷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史稿》对 1967 年初春到 1968 年的众多重大事件辍笔而过，对在此期间的许多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群众派性斗争和全国性的诸多群众思潮忽略不计，是极不妥当的。他认为：“文革”的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围、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成为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群众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对“文革”历史的创造和推动包含了他们在“文革”中的自身演变、自身反省和自身批判。“文革”时期的群众思潮和派性斗争表明，群众问题从根本上使“文革”具有了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的色彩，并且给“文革”的命运注入了难以逆转的因素。如果无视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文革”作为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活动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就无从谈起。〔4〕徐友渔也是较早关注陈佩华等人的国内学者之一，他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包含许多关于“社会冲突理论”的讨论。他指出：研究“文革”固然需要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意图，分析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格局，……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文革”远远超出了宫廷斗争的范围。人们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场把近十亿人卷入其中的群众运动。因而“文革”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广大群众的参与。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当时为甚么会有那么离奇、狂热的举动和心理，这是一个超级魔术师催眠的结果，还是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驱使他们处于癫狂状态，斗得你死我活的力量，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个人的切身利益？〔5〕以上论述表明，在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思想意识中，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已经不是“文革”研究的侧翼或点缀，而是主攻方向之一。

### 三

具体说来，1990 年代以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红卫兵”概念的认知和诠释。

在以前的许多相关论述中，“红卫兵”似乎始终是一个整体性的笼统概念。〔6〕90年以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较早公开提出应该对“红卫兵”概念做出细致分析的大陆学者是印红标。他在1992年发表的〈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一文中指出：红卫兵有许多整体特征，但是聚集在红卫兵大旗之下的，并非始终如一的统一整体，而是具有不同思想和行为倾向、互相矛盾和冲突的派别。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首次按照家庭出身的不同，将“红卫兵”概念细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等不同群体，并对其中具有鲜明政治个性和突出思想特征、先后在红卫兵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7〕在1997年发表的〈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中，他再次复述了这个观点。〔8〕

尽管其他研究者对于印红标所提出的概念划分依据以及这些概念划分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9〕，但是印红标提出的“细分化”原则却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此后的许多重要论著都自觉地遵循着这个原则。这对于更全面、更合理地解释红卫兵的造反动机和红卫兵运动中的派性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关于“红卫兵”概念细分化问题上争议较少的，是造反运动初期的情况。一般认为：“红卫兵”最初是由北京地区若干重点中学中的革干子弟和其他“红五类”子弟发起的学生组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少数高干子弟。他们以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奉行以“血统论”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试图通过对红卫兵参加者的种种资格限制，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红卫兵的数量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为了与后起的红卫兵组织相区别，这些人被称为“老红卫兵”。1966年8月初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老红卫兵”人为设置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更多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弟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概念的社会构成因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红卫兵组织也由少数中学向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蔓延，大学生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导力量。新、老红卫兵在8—10月针对知识份子群体和基层领导干部的斗争中具有大体相似的言行，但是随着“文革”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高层，“老红卫兵”中的骨干成员逐渐趋向保守，最终演变成与“中央文革”公开对抗的“联动”组织，遭到最高当局的镇压。而其他阶层出身的红卫兵则继续回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实施了对各级“走资派”的造反与夺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反派”。

在外省绝大多数地方，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是在8月前后同时产生的，因而没有“新”、“老”之分，不过基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差异的派性分野，比北京地区更加明显。

## 第二，关于红卫兵造反动机的认知和诠释。

如前所述，90年以前关于红卫兵造反运动起因的相关论述，一般都从畸形残缺的学校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封建意识和传统观念残余的消极影响、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心理等角度立论，因而大致可以归结为基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解释。这些解释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对不同社会群体影响的差异，忽略了某些消极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是如何在各种现实条件作用下逐步强化的，我们的相关论说就有可能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之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90年以后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红卫兵的造反动机作出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解释。许多论者都已经明确意识到：“文革”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导致众多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高鉴国等

人在1991年撰文指出：人们之所以接受毛泽东的“文革”理念，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与“文革”前十七年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有关，与人们对于特权等级、官僚主义现象的痛恨以及对政治压抑的反感有关。（10）印红标在1997年发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一文，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他指出：“文革”期间群众参与的政治激情，固然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随大流心理或者担心落后被整的恐惧，但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的领导层与不当权的群众之间存在矛盾。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植根于现实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郁积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11）

此外，许多论者还在“红卫兵”概念细分化的基础上，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革”早期遭遇等几个方面，对“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造反动机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出不同群体对“造反”概念含义和“造反”对象的不同理解，凸现了红卫兵造反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印红标的下列看法是所有相关论著中最为简洁明快的：

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大方向”不尽相同。老红卫兵最主要的活动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四旧”，……一般地说，老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在共产党外、非“当权派”。对于党内，只是打击少数，打击那些被认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老红卫兵相信党政军领导体系中的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是应当保卫的，他们始终警惕着右派假借造反之名冲击政权的主体，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实际上是普遍冲击共产党、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他们对大部分干部的优劣持怀疑、审视态度，他们认为走资派本身即是新生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文革运动打击的重点。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造反派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以及与对立派群众组织进行派性斗争，但是这些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

老红卫兵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建立在与旧中国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上。他们对地主还乡团、国民党卷土重来，保持高度警惕，在他们看来，复辟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会。他们相信，“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像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份子那样，为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制造舆论。……他们在“破四旧”活动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阶级敌人收藏着“变天帐”——土改前的地契、旧政府的委任状等等。

造反派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建立在与“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之上，他们更倾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是苏联，是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蜕化变质，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为压迫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相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依靠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走资派，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净化当权派队伍，是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的主要方法。（12）

### 第三，关于红卫兵派性斗争问题的认知和诠释。

派性斗争是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往的相关论述，除了对红卫兵的派性斗争表现出一种深恶痛绝、义愤填膺的姿态以外，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的解释是十分简单肤浅的——一般都归咎于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等主观因素。90年以后的许多研究者则指出，红卫兵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斗争与前文所述两个问题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唐少杰在1995年10月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文革”的群众运动由群众的武斗来收场，对立的群众组织以两败俱伤或两败俱亡为自己的归宿，这些问题既有它们生长所需的政治专制的土壤，也有它们一时“泛滥”所需的文化独断以及从思想到言行绝对排斥异己的传统背景，更有它们天然的趋向暴力的本性，但是，决定这些问题的根源依然是群众中间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13）卜伟华在其对北京高校两大对立派别的研究论文中也指出：两派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派别利益的矛盾而非有关“文革”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原则分歧。派别利益包括一个组织、一派组织的名声、名誉、地位、席位、对学校或一些单位的控制权，组织头目在社会上各种组织和各级权力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和影响等等。（14）印红标还进而指出：红卫兵各种流派的特质不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会根源，因此通过思想灌输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式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15）由此可见，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是“文革”时期派性斗争得以发生并长期延续的主要根源。派性斗争是意识形态话语掩盖下的实际利益争夺。其他群众组织如此，红卫兵组织亦如此。

其次，90年以后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一般而言，早期关于“血统论”的争论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影响，而全国性的夺权运动以后的派性斗争则显示了“文革”错误理论和实践对群众运动的毒化作用，应该彻底否定。史会来、刘晓、徐友渔等人对造反运动初期围绕“血统论”的论战和斗争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说明。

史会来、刘晓结合“老红卫兵”——“联动”组织的言论和行为，指出“血统论”同历史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等级和利益的一种工具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血统论”在“文革”期间沉渣泛起，除历史上封建传统的影响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它有着长期以来阶级路线重视“有成分论”的基础。建国以后，一贯重视以家庭成分、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造成了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这就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诸如上学、就业、婚姻、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分人的优越感和另一部分人处于受歧视和被压抑的地位。因而对“血统论”的批判带有要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积极理想诉求，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还指出：“老红卫兵”敢于公开反对将斗争锋芒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并非他们从根本上觉悟到“文革”的错误，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左的环境熏陶下形成的政治优越感的本能反应。（16）徐友渔在其关于“文革”时期异端思潮的论文和其他论著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和分析。（17）

再次，90年以后的许多论者都注意到“文革”指导思想的内在冲突和最高当局个人意志的反覆无常与红卫兵派性斗争之间的关系。唐少杰曾经就清华大学的两派斗争指出：两派关于文革属性、目的的论战不但源于各自的现实利益，而且一开始就来自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主张与部署的矛盾及缺陷。（18）从卜伟华关于北京地区“天派”、“地派”群众组织形成过程的细致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北师大和地质学院造反派为核心的“地派”对以北大、清华和北航造反派为核心的“天派”的分裂与对抗活动，与最高当局的默许和鼓励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当局刻意诱导的结果，其目的显然在于分而治之，防止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形成尾大不调的局面，危及最高当局的权威。

#### 第四，对西方学界某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的澄清和纠正。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似乎不难得出以下映象：即90年代以来关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重大进展，与大陆学界对西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接纳与应用紧密相关。因此，笔者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尽管在强调群众运动对于“文革”的重要性方面不遗余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同“社会冲突理论”或“两个文革”的观点。或者说，在“社会冲突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盲目乐观；在“两个文革”的相

互关系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简单偏执。

高鉴国等人较早公开指出：回顾“文革”前后的历史，会发现几乎每次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也都是普通群众的平等意识和参政意识以某种歪曲的或被限定的形式骤然高涨的时候。“文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它经历了有目的、有步骤的组织发动，每一次具体行动、具体运动的扩大、展开都是在得到充分肯定、引导和命令下才得以实现的。（19）

印红标曾经仿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将“文革”时期的矛盾分解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指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是不同类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但是他随后又指出：尽管社会矛盾给“文革”打下了不容忽视的深刻烙印，但是政治性矛盾——执政党内的斗争，对运动的整个过程，从起源、发展到结束，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文革”的领导者一方面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集会游行、成立群众组织、出版刊物等“大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于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20）

徐友渔则从另一个不同角度阐述了“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与现行体制的微妙关系。他指出：将家庭出身作为划分群众组织派别的唯一标准，并由此得出“造反派”带有显著的反体制倾向的结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较多的出身不那么好的人参加造反派，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共政权抱有敌意，而是“文革”事件和进程的结果。早期的红卫兵组织被奉行“血统论”的革干子弟所把持，使得大多数人被排斥于“革命队伍”之外，想表现对各级党组织的忠诚、当“保皇派”而不可得。而到毛泽东的公开信和《十六条》发表以后，到这些人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时，“文革”走势已经较为明朗，因而许多人选择参加造反派是较为自然的。由此可见，造成非“红五类”多在造反派中的原因，是类似于阿Q的“不准革命”的遭遇，而不是他们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他还指出：与保守派相比，造反派确实不满现状，不满很多当权者，甚至不满现存体制。但要注意，不能把这种不满形容为“反共情绪”。因为在群众的心目中，是毛泽东象征“中共政权”，而不是欺压他们的支部书记、积极分子代表。

他还指出：不可否认，“文革”后期或“文革”之后，群众中滋生和弥漫着程度不同的反体制情绪，更确切地说，是与“文革”前的意识形态隔膜了或决裂了。但有两点必须表述清楚：一、并不仅是造反派才产生这种疏离，原保守派和一般群众也有这种倾向；二、它产生于运动中看到太多的政治阴暗面，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但它是“文革”的结果，而不是造反派投身于“文革”的动因。（21）

大陆学者以上关于“社会冲突理论”的修正和对“两个文革”观点的否定，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认知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革”的本质属性，明确“文革”的主要责任。虽然党内斗争与群众运动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但是就“文革”的整体走向而言，是前者决定后者。关于这一点——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只要看看红卫兵运动是怎样因最高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而骤然兴起，最后又是怎样因最高当局的一次谈话会而突然终结，就不难理解了。

#### 四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不难达成以下共识：大陆学界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确的学术研究理念和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已经初步建立，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应用），多角度、多层面、

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已经形成,“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图像越来越丰满和清晰。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因为其创新性与严谨性,已经被主流话语部分接纳。

目前存在的不足,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在地域分布上和年龄层次上还过于单一。因此,如何加大对北京以外其他省市红卫兵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力度,如何加大对大学生群体以外其他年龄层次红卫兵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力度,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内努力的方向。

#### 注释

1. 关于这一阶段代表论著和主要观点的具体引证,可参见韦祖松:《“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要》,《中共党史通讯》1992年第1期;方奕:《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综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来国内红卫兵运动研究综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

2. 徐友渔:《还“文革”史以本来面目》,《今日名流》1999年第3期。

3. 参见印红标:《有待开发的“红卫兵运动”研究》,《中国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4.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开放时代》1998年第11/12月号。

5.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6. 凌巍在1989年初发表的相关论著中,曾经按照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不同心态,将他们划分为理想型、反体制型、积怨型、随大流型和浑水摸鱼型等五大类(参见凌巍:《文化大革命与第三代人》,《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笔者认为,凌巍上述基于主观心理因素的划分带有某种超验的属性,与本文所讨论的基于客观社会因素的分类存在很大差异。

7.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印红标虽然列举了四种类型,但是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保守派”似乎是“老红卫兵”的一个变种,而“极左派”则是“造反派”的一个分支。

8.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9. 徐友渔曾经指出:卷入运动的群众形成对立的派别,是“文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但是这种派性划分,绝不是简单地用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言以蔽之的。“文革”是一场运动,它经历了数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组织是不断分化组合的。夺权以后,特别是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以后,原始意义上的“保守派”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原先“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被从造反派内部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的对立所取代,这两派中往往是一派较为温和,另一派更为激进。这种情况在全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参见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华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唐少杰也指出:界定对立的群众组织及划分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颇为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在群众组织中既有“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也有两派各自内部的分化,所以纯粹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两派对“文革”的一些理论、策略和行动等有所认同,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各自的实际利益时,会泾渭分明地列出自己的阵势(参见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0. 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11.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2.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

13. 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

14. 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16. 史会来、刘晓：〈“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龙江党史》1994年第3期。
17. 徐友渔：〈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18. 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与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 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20.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1. 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华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

□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〇〇六年五月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